

# 作为一种宗教的历史主义

Tong Zhang

现代人常常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了宗教。我们不再认为某个超越世界的意志决定人类的命运。我们相信科学、制度、经济增长、技术进步，相信社会虽然曲折，却总会沿着某种方向向前。然而宗教或许从未真正消失，它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。上帝退场以后，历史开始承担过去属于上帝的一部分职能：它解释苦难，裁决成败，许诺未来，并赋予当下以意义。于是，人们不再说这是神的旨意，而开始说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
这种语言已经如此常见，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其中奇怪的地方。我们说某个人“被历史选择”，某种制度“注定被历史淘汰”，某些人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”，某些力量则“逆历史潮流而动”。但如果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总和，那么历史当然不会选择任何人，也不会拥有所谓正确的一边。只有当我们暗中赋予历史以方向、价值甚至目的时，这些句子才真正成立。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精神逐渐认识自身、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；马克思把这种运动从精神转移到物质基础，把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看作社会变迁的动力。两者差异极大，但都保留了一种深层结构：历史不是杂乱事件的堆积，而是一条具有内在动力的道路，人类处于其中的某个阶段，而这个阶段又将被下一阶段取代。

这种结构与宗教有一种微妙的相似。传统宗教相信世界有开端、有方向、有最终审判，现实中的苦难并非完全没有意义，因为它们最终会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叙事之中。历史主义也做着相似的事情，只是把天堂从世界之外搬到了未来，把末日审判改成了历史审判，把先知换成哲学家、革命家、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。它最有吸引力的地方，并不在于它真的能够精确预测未来，而在于它能够使现在获得意义。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，那么今天的失败可以被解释为暂时的，今天的牺牲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，今天的痛苦也可以被理解为通向未来的成本。“未来会证明我们是对的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现代社会最有力量的一句祷词。

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。当一个人确信自己知道历史终点在哪里时，他就很容易把未来变成对现在的授权。反对者不再只是持有不同意见，而会被视为阻碍历史的人；现实中的暴力、牺牲和压迫，也可能因为服务于某个被想象出来的未来而获得正当性。历史主义最危险之处，并不只是它可能预测错误，而是它经常把一种关于未来的信念包装成关于世界的知识。波普尔之所以警惕历史主义，正是因为人类未来的知识本身会改变未来，而我们不可能在今天预先知道未来全部的知识增长，因此也无法像预测天体轨迹一样预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。然而即使这种批评成立，人类对“历史方向”的渴望依然不会消失，因为这种渴望并不只是认识论上的，它更来自一种存在性的焦虑。一个完全没有方向的历史太令人不安了：文明可能倒退，制度可能崩坏，科学可能被遗忘，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也可能只是短暂的偶然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我们的努力未必通向任何地方。
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所谓历史趋势都是幻觉。世界确实存在强烈的方向性力量，只是这种

方向性未必来自一个预定的终点。工业化之所以扩散，并不是因为历史“希望”世界工业化，而是率先完成工业化的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优势；汽车取代马车，也不是因为汽车拥有某种历史正义，而是因为它在大量场景中具有更强的运输能力；一种新技术一旦显著提高生产率，即使许多人主观上并不喜欢它，采用它的公司、组织和国家也可能因此获得竞争优势，并进一步迫使其他参与者跟随。人工智能或许同样如此。它未必代表某种形而上的未来，但如果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越来越多的认知劳动，那么它就会通过竞争而扩散。不是因为未来在拉动现在，而是因为当下不同结构之间持续发生的选择，塑造出了我们后来称之为未来的东西。

因此，也许应该区分两种历史观。第一种认为未来存在一个确定的方向，因此现在应当服从未来；第二种则认为，不同的制度、技术、思想和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延续能力，因此某些结构更有可能穿过时间而存活下来。前者是目的论的，后者更接近进化论。后一种历史观不需要假设历史拥有意志，只需要承认复制、竞争、选择和积累的存在。物种通过繁殖延续，宗教通过传播延续，公司依靠利润和组织能力延续，国家依靠制度、暴力和认同维持自身，科学则通过教育、论文、实验和知识积累不断复制。任何能够长期存在的东西，似乎都必须拥有某种生产自身未来的机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今天存在的结构都携带着过去选择留下的痕迹。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，更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但它们至少曾经成功地使自己延续下来。

这样的理解会使“历史”失去神性，却变得更加真实。历史不再是一个知道终点的主体，而是一连串没有总体设计的筛选过程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，很大程度上是过去那些能够复制、适应、扩张和自我维持的结构共同留下的结果。这里也必须保持一个重要的区分：能够延续，并不意味着值得延续；能够胜利，也不意味着因此正确。进化可以解释猛兽为什么长出利齿，却不能证明捕食因此就是道德的；市场可以解释一家公司的成功，却不能自动证明它代表善；战争可以决定哪个帝国存活，却不能让胜利者因此拥有真理。历史真正能告诉我们的，是某些结构为什么存在，而不是它们是否应当存在。一旦我们把“存在”偷偷转换成“正当”，把“最终留下”转换成“因此正确”，历史就会重新变成一种神学。

尽管如此，人也许永远无法彻底放弃对历史意义的渴望。个体生命太短，而人又偏偏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，于是我们总想把自己嵌入一个比自己更长的故事之中。民族、文明、革命、科学、技术和进步，都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个体寿命的时间尺度。我们希望相信，自己虽然会消失，但参与的某种事业仍然会继续向前。因此历史主义之所以具有近乎宗教的力量，并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社会的理论，更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：我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意味着什么？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历史主义确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宗教。它的神不是人格化的神，而是时间本身；它的救赎不是死后的天堂，而是尚未到来的世界；它的审判也不是由超越世界的存在完成，而是由未来的人重新书写过去。真正成熟的历史意识，恰恰始于对这种宗教冲动的克制。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未来、创造未来，也可以判断某些方向比另一些方向更有可能发生，但我们不能因为某件事可能成为未来，就自动认为它因此值得发生。最值得保留的问题是：即使历史没有预定终点，即使未来不会替我们证明任何事情，我们今天是否仍然愿意选择这条道路？如果答案仍然是肯定的，那么这就不再是对历史的服从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历史。